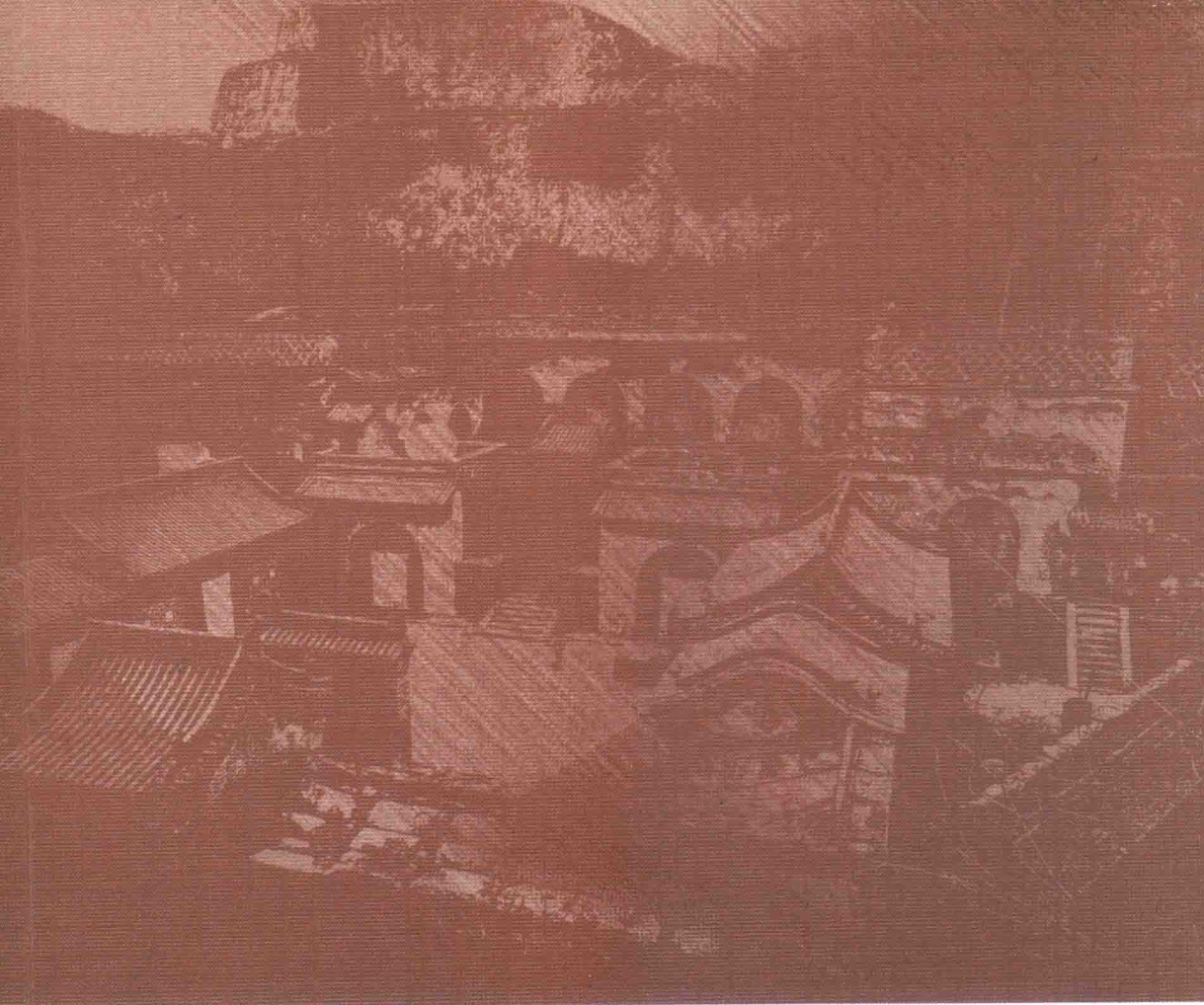




全面小康目标下 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

杨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面小康目标下 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

杨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杨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203 - 1320 - 9

I. ①全… II. ①杨… III. ①农村—扶贫—研究—甘肃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71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车文娇
责任校对 王纪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甘肃政法学院2016年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研究”（2016XZDZZ05）最终成果

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阶段性研究成果

甘肃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库

前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 2020 年即建党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的 key 时期，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难点，已成为扶贫开发的焦点。为了不拖全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后腿，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以空前的力度投入扶贫开发事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快速脱贫致富的政策。习近平曾指出：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

然而，西部地区农村的脱贫致富不仅需要高度的热情，更需要科学的措施。农村贫困问题在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有其特殊的多样化的成因。科学认识西部农村贫困问题，探索脱贫致富的正确道路，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总结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正视现实中的瓶颈，分析发展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扶贫开发的正确路径。本书从全面小康建设的要求出发，在梳理小康社会战略思想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的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对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为代表的西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历史、成就、经验、现状、障碍、问题及其精准扶贫、可持续脱贫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从而窥斑见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甘肃作为典型的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区域集中的特征显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多年居于全国末位，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搞好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对于全省乃至

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贫困、农村、农业、农民、城乡关系等科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立场、方法指引。国内外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直接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而且，国外扶贫开发成功实践经验，也为推进甘肃扶贫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

今天的扶贫开发是过去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延伸和发展。甘肃自20世纪80年代“两西”建设以来，一直是全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地区。在30多年的扶贫开发中，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的“甘肃经验”以及“甘肃精神”“五苦精神”等精神财富，为全国扶贫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精神动力，并在全世界扶贫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贫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和形成原因具有多元复合性特征，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质是整个社会现代化发展滞后。我们不能就贫困来论贫困，应在“三农”问题基础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的大视野来认识农村贫困。对于甘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农村贫困在地域和人口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从区域角度看，贫困是地理资本贫困、基础设施贫困、社会服务贫困、历史基础贫困、生产能力贫困、经营管理贫困、社会治理贫困、社会文化贫困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小规模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影响下，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剧，“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贫困农村“空心化”问题不断加重，其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从人口角度看，其贫困主要在于文化素质、家庭负担、身体健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发展需要也千差万别。扶贫开发虽历经多年，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本身也面临诸多内在矛盾和实施困境，扶贫与开发、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投入与需求、主导与主体等内在矛盾和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不够、资源整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甘肃农村扶贫开发事业进一步发展，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我们客

观上需要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瞄准主要制约瓶颈，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需要从发展目标、动力、环境、路径、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完善扶贫开发措施体系，在进一步增加投入的同时，完善体制机制，拓展发展路径，激发内生动力。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研究基础：有关小康和贫困的基本概念	24
第一节 有关小康社会的基本概念	24
第二节 有关贫困的基本概念	30
第二章 研究视角：全面小康建设目标	44
第一节 小康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社会理想	4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目标的理论探索	45
第三节 改革开放实践对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	55
第四节 2020 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解析	67
第五节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	78
第六节 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行性	84
第三章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理论	93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思想	93
第二节 列宁关于农村建设和城乡关系的思想	105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	118
第四章 理论发展：新时期“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与精准扶贫	129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农村建设思想的发展	129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建设的推进	140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以来“三农”问题新战略	145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战略	149
第五节 精准扶贫战略	155

第五章 国际借鉴：国外反贫困的经验借鉴与思考	160
第一节 开发式扶贫	161
第二节 保障式扶贫	166
第六章 实践基础：甘肃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措施与经验	172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村反贫困政策历史回溯	172
第二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措施归类	180
第三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措施的效果分析	199
第四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	203
第七章 现状分析（一）：甘肃农村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212
第一节 贫困现状及特征	213
第二节 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229
第八章 现实分析（二）：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内在矛盾与 有利条件	252
第一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内在矛盾分析	252
第二节 现行反贫困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263
第三节 甘肃扶贫开发面临的有利条件与历史机遇	266
第九章 研究整合：推进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思考	272
第一节 瞄准小康目标，找准脱贫关键	272
第二节 调动积极因素，增强脱贫动力	274
第三节 改善发展环境，夯实脱贫基础	282
第四节 广开增收渠道，拓展脱贫路径	289
第五节 完善帮扶机制，增强脱贫保障	292
结 论	297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11

导 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 选题背景

贫困是长期伴随人类的痛苦和难题,缓解乃至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景和不懈追求,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主要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等,贫困人口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农村。改革开放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据统计,1978年我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按照1196元的标准)。由于我国的贫困线低于国际标准,2011年国务院大幅提高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也随之大幅增长。按照提高后的标准(2010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3年我国有8249万贫困人口,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7017万,2015年减少到5575万,2016年减少到4335万。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且于2014年下降到4.2%,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面积绝对贫困的现象基本消除,我国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我国农村反贫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也雄辩地说明了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科学性。

但是,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任务依然艰巨。一是我国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大,2014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7017万,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8862万。贫困人口集中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边远山区、生态脆弱地区等，区域边缘性特征明显，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70%。^①二是时间紧迫。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要求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大的短板和难点就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阶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扶贫开发能否在此阶段取得重大进展，关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着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据粗略测算，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几年每年需减少贫困人口约1200万。三是扶贫开发的难度加大。根据国际有关减贫理论和经验，当一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降到10%以下时，通常会进入减贫的瓶颈阶段，这部分贫困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摆脱贫困，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脱贫，传统的区域开发式扶贫措施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随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不断推进，剩下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成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农村扶贫开发正面临成本攀高、难度加大、效率降低、效果不稳固等现实困境。同时，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扭转，贫困地区内部不同阶层群众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相对贫困突出。为了确保按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

甘肃省作为有代表性的西部省份，农村贫困面广，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历来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要战场。全省有58个县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四省藏区），另有17个插花型贫困县（有需重点扶持乡村的非片区县），总量约占全省县级单位总数的87%。按照提标后的贫困线（2010年不变价的2300元），

^① 范小建：《我国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面临“四大挑战”》，http://www.gov.cn/jrzq/2011-12/09/content_2016227.htm，2011年12月9日。

2011年甘肃省确认的扶贫对象达722万人,占全国1.22亿扶贫对象的5.9%,贫困发生率达34.6%,位居全国第二。但实际上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为842.2万人,实际贫困发生率为40.3%。到2014年年底,全省有贫困人口417万,规模居全国第7位;贫困发生率20.09%,居全国第二。常年返贫率一般在15%—20%。另外,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省级单位排名中常年处于最后几位,其中2007—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处于全国末位。以2013年为例,当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07.76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7.4%,约为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的26%。而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以2012年为例,该年甘肃省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374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70元,约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7.33%。全省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2078元,低于国家贫困线(2300元)222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6.6%和全国平均水平的26.4%。^①可见,甘肃贫困地区农村贫困问题严重,是全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场域,其扶贫开发不仅关系到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必将对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产生影响。

当前,全省乃至全国进入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的高潮,甘肃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事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等举措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投入的力度空前。甘肃的农村扶贫开发事业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以及兄弟省份的有力支援,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考察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大力扶贫攻坚的推动下,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社会面貌迅速改观,当地农民群众获得了有力的帮扶。然而,甘肃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也面临新的不利条件。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甘肃省经济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不仅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省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较突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相对发达地区、城镇和非农产业加速转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剧,“留守”“空巢”问题

^① 《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划(2013—2018年)》。

越来越严重；农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下降，越来越多的农田被抛荒；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不断弱化，贫困地区农村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呈现加速“空心化”态势。

（二）选题意义

在当前加速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贫困地区农村自然趋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农村扶贫开发事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村大规模扶贫开发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过去的“药方”并不能直接用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扶贫开发措施已不能满足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现实需要，推进农村的扶贫开发深入发展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顶层设计，采取系统的措施。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贫困问题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但我国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研究成果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30多年里，而且有较大影响的成果较少，特别是基础理论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反贫困的理论支撑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大部分学者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理论成果为基础，很少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来探究我国的农村贫困和反贫困问题，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农村发展理论，是我们理论工作的重大使命。西方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理论借鉴价值，但并不能充分、准确地解答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直接用于解决以甘肃农村为代表的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认为：世界经济繁荣之路，在于贫困国家必须独立策划自己的经济道路，不能一味模仿富裕国家。我们要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必须努力构建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以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理论指导我国的未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的关于农村建设、城乡关系、农村改革等的理论思想，对于促进农村贫困的解决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以此作为进一

步推进甘肃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引。

另外,理论界关于甘肃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农村反贫困具有动态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甘肃农村扶贫开发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发展基础、具体目标、政策环境、群众需求等都较过去发生了变化,因而扶贫开发的思路和举措也要与时俱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为反贫困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甘肃作为我国大规模有组织扶贫开发的先行先试区,在全国扶贫开发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认为:世界扶贫看中国,中国扶贫看甘肃。甘肃人民在与贫困长期斗争的历程中,探索出了诸多有效措施,在全国乃至国外广泛推广应用,如“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集中连片扶贫开发模式、扶贫资金“要素分配法”等。党中央提出的许多扶贫开发战略在甘肃首先试点,积累经验。这使得甘肃诸多扶贫开发措施成为全国的典范,为全国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不断总结反思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有效丰富我国农村反贫困理论宝库,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贫困居民脱贫致富,而且可以为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提供有益启迪。

2. 实践意义

全面、客观地认识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特征、实际情况以及群众的需要,找准制约瓶颈;同时,系统反思现行扶贫开发措施的得与失,厘清现行扶贫开发面临的时代特征、内在矛盾、主要障碍及其原因,确定扶贫开发的发展目标、思路,提出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措施体系的合理化对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甘肃省扶贫开发事业,提高扶贫开发措施的脱贫效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甘肃掀起了新一轮扶贫开发的高潮,投入的力度空前。但外在的帮扶如何有效地转化为贫困地区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如何使有限的政府投入发挥更大的益贫效益,是当前甘肃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现实难题。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于深化扶贫开发,进一步提高扶贫开发效率,促进贫困农村可持续脱贫致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甘肃贫困农村在广大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扶贫开发事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于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而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对于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甘肃具有重要的战略区位,不仅是中原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欧亚大陆桥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咽喉,而且是多民族、多宗教交汇融合的地区,具有地缘重要性。同时,农村贫困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交汇点、各种农村社会问题的聚焦点,脱贫致富对于农村其他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研究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脱贫致富,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稳固等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

(一) 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1. 西方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贫困、反贫困、发展问题是经久不衰的经济学热点课题,在以“财富增长”为目标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贫困、穷人、反贫困、发展等的研究源远流长,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都涉及此类主题,有的学派或代表人物则以贫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演讲中提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问题。”^①不少研究贫困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冈纳·缪尔达尔(1974)、威廉·阿瑟·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1979)、阿马蒂亚·森(1998)等,还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丰硕,但流派和主线较多,其内在的凝聚力较弱。我国学者贺静在《西方经济学穷人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及启示》中,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将西方经济学关于穷人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分为三个派别:干预派、自由派、异端学派。干预派的基本主张是:国家应在穷人问题上有所作为,通过改善穷人状况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稳定资本主义统治的目的。自由派的主张是:穷人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牺牲

^① [美] 西奥多·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罗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这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国家的干预不仅不会改善穷人的状况,而且会使问题更糟糕,即使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其程度和范围也应该是有限的。异端学派一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学派的观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认为社会改良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方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三条理论主线: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理论主线、公平分配理论主线以及和谐与冲突理论主线。与此相关的理论派别有穷人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正义论等。王俊文(2007)认为西方反贫困理论构建主要有三个来源:(1)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简称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提出的“漏斗理论”、保罗·A.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出的“收入可能性曲线”等为代表。(2)福利经济学,以J.A.霍布森、阿瑟·C.庇古在《财富和福利》中提出的以增加社会福利总量为宗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帕累托最优状态”为前提的新福利经济学,以及阿马蒂亚·森以收入均等程度为指标的福利经济学等为代表。(3)发展经济学,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的反贫困思想为代表。对于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国际上有三种主体模式:(1)资源配送模式,它属于典型的传统西方国家或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成员的福利观。(2)惩罚“机能障碍”(Dysfunctional)模式,从研究贫困人口自身社会组织角度入手,针对物品传送解决贫困问题低效状态,侧重考查贫困人口生活方式与社会规范,强调以消除“机能障碍”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属于新自由(Neoliberal)主义观点。(3)介入“机遇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模式,将贫困与“机遇结构”缺乏联系在一起,从对贫困人口进行研究转向对导致贫困状态的社会及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观。

在研究贫困问题的众多学派中,学者们一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出发,研究贫困问题。有的研究则专门针对贫困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如贫困概念、标准、成因、反贫困的对策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不少成果对于我们当前研究甘肃农村贫困问题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在贫困的原因上,相关理论主要有地理资本贫乏论、投资短缺论、恶性循环论、人力资本缺乏论、人口挤压论、制度不利论、文化贫困论

等。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原因具有启迪意义。例如，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认为：贫困是资本供给方面的“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和资本需求方面的“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抵消了投资增长，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无法增长，解决的办法主要包括改良社会结构、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人口比例、制定政府投资计划等。缪尔达尔（1957）提出的“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认为，收入水平低、人口素质不高、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产出率低等致贫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呈现“循环积累”的态势并难以摆脱；他强调通过制度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通过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托达罗的“自然资源贫乏论”认为，贫困在地理上与不同的气候环境所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原因具有启迪意义。

在反贫困对策上，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罗斯托的成长阶段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梯度转移理论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摆脱贫困的道路，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于我们探索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发展路径具有启迪意义。例如，哈维·莱宾斯坦（1957）基于“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落后国家需要通过足够大的推动力冲破“准静止均衡”状态，从而实现长期的持续发展。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1）的“大推进”理论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要克服经济停滞状态，就要有足够大的投资量以推动其走上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工业化。此类观点对于我们通过对贫困地区加大投入力度，突破其主要制约瓶颈，打破贫困恶性循环，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价值。但是，投资只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要素。纳迪里（1971）认为，资本形成虽然重要，但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弗朗索瓦·佩鲁（1955）提出的“发展极”理论主张，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应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